



汉赋研究

袁克昌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汉赋研究

龚克昌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济南

汉 赋 研 究

龚 克 昌 著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7.625印张 166千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50

书号 10331·63 定价 1.10元

说 明

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再也找不出任何一种文学象汉赋这样有争议了。西汉的扬雄说，写汉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因而誓曰：“壮夫不为！”南朝的沈约却说，司马相如等人的赋是“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从艺术形式到思想内容都加以全盘肯定。但对汉赋评价最高的莫过于近代学者王国维，他视汉赋为两汉四百年文坛的总代表，并把它放到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同等的位置上。解放后的前二十八年，人们对汉赋的批评是比较厉害的，近几年来则渐渐出现给予适当肯定的趋势。我的看法主要是：应把汉赋放到两汉这个文学艺术发展的早期阶段，放到文学艺术尚处在经典附庸的地位之下，经学统治着两汉文化思想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评价，因而我们对汉赋的不重视讽谏、以及它的夸张虚构和追求辞采的华丽等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就得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相应的结论。我的看法在二十一年前曾引起人们的注意，已故的陆侃如先生、冯沅君先生，和今天尚健在的吴富恒先生、高亨先生、殷孟伦先生、蒋维崧先生、严薇青先生，都曾审阅过我的论文——就是这个小册子的前身，并一致认为：“论文的论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作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也是比较丰富的，文章的逻辑较强，文字通顺流畅”等等。近来，我根据当时征求的各位先生的意见，对论文作了较大的修改，加强了文章的理论

性，增补了一些篇幅，充实了部分内容。修改后又请殷焕先先生全面审阅过。殷先生阅后给我的信中谈了三点看法：“一、不袭固常，独抒新见；二、使汉赋在汉文学史上恢复其应得的光辉地位。汉民族文学家于此特实亦大有作为者，殊非默默然留一庸俗空白点；三、论文殊得作者之用心，不为虚美，得其实质，用心甚勤，表彰之功，诚堪称道。”前面提到的陆侃如先生等和这里的殷焕先先生对拙作的褒扬，我是受之有愧的，这只能看做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之所以把他们的话引出来，只想说明，我们老一辈的学者们对汉赋的地位是有一定的看法的，都认为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适当的评价。他们的谦恭、谨慎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本集子中的《总论》、《汉赋奠基者司马相如》、《班固赋论》、《张衡赋论》、《散赋作家枚乘》、《刘勰论汉赋》几年来曾分别在《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文学遗产》、《中国文学家评传》、《古典文学论文集》、《文心雕龙学刊》中发表过。因为是单篇刊发，这次收在一起，难免出现个别地方的重复，这是需要说明的。

本书尚属初探性质，现在的书名是承一位朋友的好意起的，实不敢当，姑置于此，以为自励。

本书增补的部分篇章的初稿是彭重光执笔的。彭重光还负责全书的誊写工作。

最后，对帮助我审阅论文的诸老先生，尤其是殷焕先先生，再次表示我深深的敬意！

作 者

一九八三年十月

目 次

说 明	
总 论	1
骚赋作家贾谊	43
散赋作家枚乘	56
汉赋奠基者司马相如	68
扬雄赋论	92
班固赋论	120
张衡赋论	145
抒情小赋作家赵壹	178
汉赋探源	196
 附录：刘勰论汉赋	 214

总 论

大汉王朝是随着短暂的秦王朝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比较长期稳定繁荣的多民族的朝代。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头一次扬眉吐气的时代。可是有谁能够相信，伴随着这样时代的文学艺术的汉赋，竟然长期处在人们诅咒之中。是中华民族缺乏创造文学艺术的才能吗？或文学艺术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理应处在如此悬殊的不平衡地位吗？这个问题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敲打着我，逼我深思。经过一番的学习和探讨之后，我已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汉赋并不是那样毫无可取。汉赋是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的。千百年来强加在它身上的一些鄙薄之词是到了可以推翻的时日了。我们应该给它恢复名誉，把它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来评价，作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加以批判地继承。

人们批评汉赋，尤其是解放后人们批评汉赋，总喜欢引用西汉赋家枚皋、扬雄和东汉赋家蔡邕批判汉赋的话作依据；以为赋家批判汉赋，最为权威，最能服人；殊不知这些赋家批判汉赋，是具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含有其特殊的思想动机的。《汉书·枚乘（附枚皋）传》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

为赋颂，好曼戏（褒贬戏谑）……皋为赋善于朔（东方朔）也……上（指汉武帝）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有诋嫫（毁谤）东方朔，又自诋嫫。”

从本传的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枚皋的赋多是奉命而作的。这种赋要符合皇帝的口胃，满足他们的需要。枚皋赋的这种情况是有代表性的，很多赋家的赋就是在帝王的授意下，根据他们的要求而创作出来的。说明汉赋的兴盛与帝王的提倡大有关系，这也正是造成汉赋思想内容不足的一个原因。枚皋的赋在这方面可能走得更远些，创作的态度更轻佻些。但即使如枚皋所说的“为赋乃俳，见视如倡”，把赋家看成俳优——古代杂戏、滑稽戏一类演员；看成倡——古代的歌舞演员，难道倡优就应该轻视吗？就应该给予贬斥吗？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人们对倡优就一直瞧不起，他们的社会地位极低。《国语》六《齐语》说：“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优笑在前，贤材在后，是以国家不日引，不月长。”这里，优人被放在贤材的对立面，以为抬高了他们的地位，则国将不国了。《国语》二十一《越语》下说：“今吴王淫于乐，而忘其百姓，乱民功，逆天时，信谗，喜优，憎辅，远弼，圣人不出，忠臣解骨……”这里把喜欢倡优与听信谗言看成是同样的大坏事，并置谗人与优人于辅弼大臣的对立面，以为国君如果听信谗言，喜欢倡优，就必然要厌弃疏远大臣，就必将导致圣人忠臣的潜逃和离叛，不能为国所用了。《管子》《立政九败解》六十五说：“奸人在上，则壅遏贤者而不进也。然则国迨有患，则倡优、侏儒起而议国事矣！是驱国而损之也。”这段实际上也是把倡优、侏儒与奸人视为同类，以为国将有忧患，就会出现倡优、

侏儒参与国事，从而把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把倡优的地位抬高到辅弼大臣的位置上，让他们去治理国家；也不是赞同国君可以整天沉浸在歌舞欢笑声中。我们只想指出，在人们的心目中，倡优的地位是极卑下的，他们往往被视为不祥之物，是人们厌弃的对象，同时也是帝王取乐的工具。他们连普通人的地位都不如。到了汉代，他们的地位甚至每况愈下，这从前面所引的枚皋的话和后人将引的汉宣帝的话，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极有眼力，值得我们敬佩的倒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其《史记》里，专门列了个《滑稽列传》，把这些被人们看不起的人物写到传里去，肯定了他们：“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指孙叔敖子被封寝丘）；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指陛楯者可以轮留避雨），岂不亦伟哉！”对司马迁这一举止，人们是赞赏的。刘勰就说：“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譎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文心雕龙·谐隐》）近人吴梅也说：“司马迁《滑稽》一传，主以达民情之隐，而‘谈言微中，亦足解纷’一言，更足徵史家之卓识。”（《中国近世戏剧史》）董每戡更说：“俳优被人所看作下贱的东西，并非俳优能戏语讽刺统治阶级，这些都不是偶然的现象，都有它凭藉以产生的社会根源。存在着这个根源，便是不合理的奴隶或封建制度。所以身受封建政权残害的太史公，有心特费一笔，为古优们立传。所谓‘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确是高见！”（《说丑相声》）他们都一致肯定俳优的作用，肯定司马迁为俳优立传，给俳优以应有评价的卓识。董氏

还正确地指出俳优被人瞧不起的社会根源。所以，只有象班固那样的封建正统人物，才瞧不起他们，才在他那部以《史记》为基础而修起来的《汉书》中，把《滑稽列传》这一项目删弃。难道我们今天也要从司马迁所走过的道路上退回来，退到班固等人的立场上去吗？所以，以为汉赋作家有类倡优而加以否定，是极不应该的，是封建正统思想的遗毒在作怪！

蔡邕批判汉赋的言论也是人们所乐于引用的。他在给汉灵帝的“封事”（许多人误以为是张衡的《论贡举疏》）中说到：“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谕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后汉书·蔡邕传》）蔡邕这个看法，其实是很错误的，“有类俳优”云云，其错误我们前面已作了分析批判，这里不再重复。

“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按职业不同来区别才干高低，贡献大小，其偏颇之处也无须多说。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蔡邕之所以贬抑辞赋，是与其推崇经学儒术联系在一起的。蔡邕这节“封事”的主旨是谈人材的选拔。他主张从经学之士中遴选官吏，而反对任用赋家；同时也谈到经学的倡导问题。为说明问题，现把这节“封事”的前后两部分分别摘引并剖析如下。“封事”的前半段说：

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

孝廉与文学贤良都是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由各郡国在所属吏民中荐举。不用说他们都是些用儒家思想培育出来的人物。蔡邕赞赏汉武帝用这种办法来选举人材，他不同意甚至极力反对

从辞赋作家中选拔人材。他甚至建议，对那些已被录用的辞赋出身的官员，不能让他们临政理事，所谓：“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俸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

“封事”的后半部宣扬了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的两个经学会议：

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三月，宣帝诏《五经》名儒萧望之、刘向、周堪等，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最后由宣帝亲自裁定，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这就是所谓“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是指章帝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这是今文经学派利用皇帝亲自主持的会议，以保持自己思想上的统治地位。由此可见，蔡邕是完全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从热切地要求提倡经学任用儒士出发，来反对赋家和赋作。这实在是不足为训的。

扬雄鄙夷汉赋的出发点也正是这样。扬雄在《法言·吾子》里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雕虫篆刻是西汉学童必须学习的秦书八体中的虫书和刻符两种。扬雄意思说，写赋是学童所为的小技小道，大人是不干的。扬雄为什么由“少而好赋”到“壮夫不为”呢？其原因也不在赋本身，而是在于扬雄壮年后思想发生了变化。这时扬雄一方面认为“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法言·寡见》）又说：“山岨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

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法言·吾子》）扬雄把儒家《五经》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对孔子也崇拜得五体投地。另一方面又以为：“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法言·问神》）而赋呢，正是这类东西：“颇似俳優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汉书·扬雄传》）所以扬雄壮年以后“悔之”——后悔了，发誓不再写赋，把精力转向钻研经学儒术上，仿《易经》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所有这些都说明，扬雄与相距一百多年后的蔡邕一样，他对汉赋的鄙弃，也是与崇经尊儒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实在并不高明，实在是不值得我们赞扬的。

那么为何人们鄙弃汉赋往往与尊儒崇经联系在一起，不作赋就往往去从经呢？鲁迅所指出的，司马相如常常称病，不到汉武帝面前去写诗作赋献殷勤，却暗暗地作封禅文章（见《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也同属这类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有必要谈谈经学儒术在两汉的地位和影响。

在两汉，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儒术获得了独尊的地位，《诗》、《书》、《礼》、《易》、《春秋》成了儒家的经典，合称《五经》。《五经》的地位极高，成为法定的教科书，朝政的指南。因而通经的往往可以做官，做大官，所以学经的人极多，经学盛极一时。先是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推行一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汉武帝又根据公孙弘的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鼓励地方官学经，并根据成绩的优劣加以升黜，在地方政府中增补通经的官吏，等等。以后各朝代的情况也差不多。昭帝时，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

宣帝又“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蠲免征赋）”，“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大学增弟子员三千人。（以上见《汉书·儒林传》）光武帝“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明帝甚至亲自讲经，“诸儒执经问难”，“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他还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另立校舍，广招生员，“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本初元年（公元146），梁太后下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以上见《后汉书·儒林传》）。数以千万计的经学之士云集京师了。

除中央的太学经常聚集着成千上万的儒生外，地方上也大办学堂，教习儒经。汉武帝推广蜀郡守文翁在成都修学馆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馆”（《汉书·儒林传》）。对入学的弟子多加照顾，学习成绩好的可以做官。此外，各地名师大儒也纷纷设立精舍，广收门徒，数目也极惊人。东汉张兴、牟长、蔡玄常有门生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宋登、魏应、丁恭也都有著录门生数千人。楼梦有门生九千余人。（以上见《后汉书·儒林传》）这些数字在教育不甚发达的中国两汉时期，是相当可观的，它庶几囊括了当时的知识界人士了。

班固曾指出：“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汉平帝年号，公元1—5年），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赞》）事实正是这样。两汉的统治者是利用禄位来吸引人们学经的。公孙弘以治《春秋》而被破例擢升为丞相，封平津侯，这是第一个以经师

身份当丞相，得侯封的人。这事在文人中犹如一声春雷，使大家惊慕不已：“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从此以后经师当丞相的就更多了。而地方上的郡守、县令更充斥着经学之士，班固所说的“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以上见《汉书·儒林传》），就是这个意思。经师夏侯胜常对他的门生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显爵）如俯拾地芥耳。”（《汉书·夏侯胜传》）他利用利禄来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桓荣年青时，生活很困难，但他“讲诵不息”，后来当了光武帝的少傅，受到优厚的待遇，他激动地说，“今日所蒙，稽古（指解经）之力也，可不勉哉！”他的朋友桓元卿说：“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后汉书·桓荣传》）韦贤的几个儿子都因学经而做了郡守县令之类的地方上长官，而“少子玄成，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因而当时邹鲁民谚说：“遗子黄金满籝（竹箱），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学经成了人们升官发财的捷径，很多人都狂热地在经学的道路上奔跑。这就是汉赋遭受排斥的背景，也是汉赋受到鄙夷的原因。所以枚皋、扬雄、蔡邕等最后摒弃汉赋，是不足为怪的，他们的言论行为，也是不足为训的。如果我们附和了他们，无异于站到经学家的立场上去。

如果再进一步看看两汉的经学对人们的思想所起的禁锢作用，以及把经学引向烦琐穿凿的死胡同中去，我们就更能清楚地看到用尊儒崇经的观点来菲薄汉赋是多么不公正！范晔曾指出：经学“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所以东汉桓、灵之时，皇帝昏庸，朝廷腐败，纲纪松弛，一般人都能看出汉王朝将要灭亡。但“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甚

至象张温、皇甫嵩那样“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业可移”的强有力人物，仍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这是什么力量起作用？范晔说：“斯岂非学之效乎？”“诵先王之言也，畏逆顺势也。”“故先师垂典文（指儒经）褒励学者之功笃矣，切矣！”（以上见《后汉书·儒林传》下）这就是儒经起到了禁锢人们思想，抑制“犯上作乱”的威力！

但由于经学的恶性发展，也使它自己很快陷入到穿凿附会的烦琐的绝境中去。如“（秦）恭增师法至百万言（师古注：‘小夏侯本所说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故至百万言。’）。”（《汉书·儒林传》）“秦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桓谭《新论·正经》）有人甚至为解经劳累过度而“死於烛下”（王充《论衡·效力》）。所以班固沉痛地指出：“古之学者，……二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艺文志》）经学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了。到了汉末魏初，已出现了“家弃章句”的局面，经学已走到了“物极必反”的道路上去，彻底地衰亡了。

但汉赋呢？它却以崭新的面貌始终屹立在两汉的土地上，并以其固有的特色影响了中国近两千年的文坛（详后），两相比较，孰优孰劣，不是判若云泥了吗？所以用抬高经学来贬抑汉赋，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今天要把这两者关系倒过来，把汉赋的地位高高地置于经学之上。

二

汉赋受到人们鄙弃的又一原因是它的放弃或弱化讽谏。对汉赋持这种态度也是很错误的。

在先秦，人们从文学的社会作用的立场出发，已注意到讽谏的问题了。如《诗经·魏风·葛屨》：“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诗经·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诗人对社会上的一切不好的事物，都要运用诗歌来加以讽刺或谏诤。史书上也有同样的记载。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说：“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国语·周语上》也说：“故天子听政，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但是除了讽谏、教诲之外，诗歌当然还有其他的作用，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就是说，诗歌对读者有启发鼓舞的作用，有认识社会的作用，有教育团结的作用，有讽刺教诲的作用；可以事君，也可事父，还可以增长知识。诗歌的作用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就讽谏来说，也大大超出了对君上讽谏的范围。事实也是这样。如《诗经》十五《国风》中的许多爱情诗，就不是讽谏所能包括。《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季札观乐，吴季札也认为《诗》三百篇主要是反映现实，反映各地的风土人情，而不是讽谏。

但是到了汉代，情况就发生了极明显的变化。清人程廷祚说：“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两端。”（《诗论》十三）所谓“美”，就是歌功颂德；所谓“刺”，就是讽刺谏诤。程氏这话是有根

据的。如《毛诗序》认为《风》诗的作用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所谓谏，就是说对统治者进行批评时，要运用委婉曲折的方式，不能直接指出君上的过失；也就是孔子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风。而《颂》的作用则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就全属歌功颂德的范围了。

班固也有类似的论述，他在《两都赋序》里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风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他先是把赋和《诗》挂起钩来；而按汉人的观点，《诗经》就是表现美刺两方面的内容，所以赋也很自然是臣下对君上的讽谕或颂扬。

但在实际评论中，讽刺、讽谏甚至更为人们所推重。如司马迁在评论屈原与宋玉等人的高低时就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这里，敢不敢直谏，成为评鹭屈宋等高低优劣的标准。当然，直谏与讽谏、讽刺在程度色彩和方式方法上有所区别，上面所举的孔子和《毛诗序》，就不主张直谏；但它们同属对帝王君上的批评劝说当是无疑的。屈原的作品就说明这一点。鲁迅说过，“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如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又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鲁迅这话是很深刻的，屈原写《离骚》，对楚怀王的批判，的确是为了楚怀王、楚王朝好，再直谏再尖锐也超不出这个范围。再则，